失地农民社会融入路径异化与内卷化研究

江维国[a]，李立清[b]

（湖南农业大学 a.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b.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从理论推演看，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并不会遵循经典理论构想或学者们预设的“迁移—适应—融入”线性轨迹演绎，而是会出现路径异化和内卷化。从实证检验看，基于 1935 个样本数据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相对安置搬迁时间为“7 年及以上”样本，“1 年及以下”到“6 ~ 7 年”样本更容易融入社会，但融入优势具有逐渐变大再逐渐变小的演变特征。这说明失地农民社会融入会沿着“缓冲适应—快速融入—融入转折（路径异化）—融入内卷化”轨迹运行。为此，应加强搬迁前的思想教育、搬迁后的技能培训与就业支持并强化融入中的心理疏导和建立社区支持系统。

关键词：失地农民；社会融入；路径异化；内卷化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0202(2018)01 - 0059 - 10

一、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研究缘由及进展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进程和重要标志，城镇化建设必然伴随着农村集体土地不断被征收和失地农民持续产生。《2011 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当年我国失地农民为 4000 ~ 5000 万人，且每年以约 300 万人的速度增加，到 2030 年该群体总数量将增至约 1.1 亿。然而，数量如此庞大的失地农民群体，在脱离原本熟悉的生产生活场域以及由亲缘、血缘构筑的社会交往网络并在安置社区集中居住后，尽管身份被漂白为城镇居民，但却游离于城镇正式和非正式体系之外，甚至成为了社会矛盾激化的隐患和“有增长、无发展”的现代化陷阱与“新二元分割”的标志。有研究指出，城里人、同事只占失地农民日常交往对象的 10.94%，而亲戚、朋友和原村熟人的占比则高达 89.06%[1]。当前我国失地农民心理异常率为 42.5%，远高于发达国家失业人群 23.4% 和国内城镇失业人员 28.6% 的心理异常率[2]。这些数据从不同侧面映射了当前我国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尴尬处境以及地方政府在践行“共享”发展理念方面的严重欠缺。

应该说，素材丰富和时代要求使得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研究在国内出现了纷繁复杂、多元并存可喜局面。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包括生活、就业、身份、心理等方面的适应与认同[3]。但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必然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以及小农意识催生的自卑感等多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面临重重障碍[4]。因此，当前我国失地农民社会融入水平严重偏低[5]。尽管这是社会结构的意外性后果而非行动主体主动性作用的结果，但失地农民如果无法及时融入社会，则容易在羊群效应影响下传递负面情绪，造成群体性的焦虑、不信任、怨恨、偏激与充满戾气，消解社会共同体的情感价值体验，威胁社会稳定[6]。因此，需要完善公民政治参与机制、允许体制有一定弹性空间、壮大集体经济组织、建立过渡性管理体制以及理顺各类组织间的关

收稿日期：2017 - 10 - 17　　**DOI：**10.7671/j.issn.1672 - 0202.2018.01.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1BJID38）

作者简介：江维国（1973—），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保障、农业经济管理。E - mail：469048951@qq.com

系[7],并要从居住空间入手,使失地农民与原城镇居民混居,以规避孤岛化集中安置的弊端[8]。

总体上看,目前国内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尚囿于"针对现象、探究原因、提出对策"的常规分析框架,多数成果止步于策略层面的探讨。就失地农民社会融入所表现出来的规律特征及其内在原因,并从理论与实证双重角度深入探究的成果还存在欠缺,本研究旨在对此进行弥补,以期为关系到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的失地农民社会融入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二、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理论分析

概念辨析是理论推演的基本前提,理论溯源与商论是发现理论缺陷的重要途径。因此,本研究以社会融入概念辨析为切入点,并通过对社会融入相关理论的溯源与商论,进而构建失地农民社会融入路径异化与内卷化的理论框架。

(一)失地农民社会融入概念辨析

从学术渊源来看,社会融入是与社会排斥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法国学者 LENOIR R 在研究贫困群体的社会融入时首次使用了社会排斥概念,并将社会排斥现象出现的原因归结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所引发的社会阶层分化[9]。同年,法国政府在制定低收入群体就业促进的社会政策时,正式使用了社会融入一词。21 世纪初,欧盟在其相关报告中基于社会公平视角对社会融入作了如下界定: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使其能全面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并享受正常的社会福利。后来,随着其他学科的陆续引入和广泛使用,社会融入实际上已经逐渐演化成了一个模糊的、多角度的和内涵广泛的概念,其使用范围从最初的社会学拓展到了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等其他学科领域。因此,本研究认为,从广义角度看,社会融入是指某一特殊体或个体在特殊情境下对新的生产、生活、行为、规范、习俗、文化等所进行的调适过程及结果。

失地农民是对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集体承包地被国家依法征收后无法依靠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以维持生存与发展的群体的统称。失地农民从原来熟悉的生产生活场域进入一个相对陌生的城镇环境开始全新生活,社会融入问题由此而产生。可见,失地农民社会融入是指,因国家公共利益需要而失去承包土地及依附于土地上其他诸如就业等权益的农民迁离原居住地后,对城镇新环境从生产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以及文化习俗与价值观念等所进行的调适过程及其结果。总体上看,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具有被动性、能动性、持续性、交互性以及社会性等特点[10]。被动性是指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起因是被动的,源于城镇化建设下的土地征收。能动性强调的是失地农民具有社会融入的认知和能力以及意愿与动机。持续性强调的是融入过程的漫长性和动态性。交互性是指失地农民与城镇居民、用人单位、社区以及地方政府等主体在信息、情感等方面的交流、沟通与相互作用。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社会性无疑是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本质属性[11]。由此可见,失地农民社会融入是一个多维视角的概念,具有较为独特的空间结构、时空意义以及形成机理与演变规律。

(二)失地社会融入理论溯源与商论

国外学者较早创建了有关社会融入的经典理论。一般认为,社会融入必然内在地包涵着主体和客体两个不同的主体,也就有了主次之分[12]。也许正是顺着该逻辑,国外学者们最初在研究国际移民融入东道国时,其视角均聚焦在移民这个客体对东道国这个主体的依附与被同化。在西方学界颇具影响的"融合论"就认为,移民的融入是摒弃原文化和生活习俗并认同东道国主流文化与生活习惯的过程。与"融合论"脉出同门的"同化论"同样认为,经过经济稳定、主流文化认同以及语言熟悉等阶段后,移民客体就能融入东道国主流社会之中[13]。然而,这种主观认为客体的社会

融入生发过程具有单向线性轨迹特点的学说,既忽视了客体异质性导致的融入轨迹与结果的非同一性,也容易成为种族歧视和人种优劣论的理论支持工具。在欧美国家民权运动兴起背景下产生的“多元文化论”对此进行了矫正,提出了移民社会融入同时受自身文化、迁入地文化和迁入地态度三重因素影响的观点[14]。因既符合西方国家民族结构与文化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实现,也有利于抑制种族歧视情绪,西方部分国家陆续将“多元文化”纳为国家政策,对移民客体携带的原文化开始持包容态度。

发展至今,尽管上述理论被认为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既忽视了“规范性”的政治制度、传统习俗也忽视了“意志性”的认识能力、心理活动在社会融入中的影响,对复杂的社会融入问题持过于乐观态度[15]。但这些理论构建了一个“移居—适应—融入”分析框架,这种具有递进特征的学说为后期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分析范式。如 W R Bohning 在总结移民社会融入过程时,就提出过“发生—定居—生存—发展”四阶段模型[16]。国内学者周皓同样构建了一个“定居—经济融入—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入—身份认同”的社会融入阶段模型。之后,针对递进学说的不足,有学者提出了社会融入的多维学说。多维学说认为,社会融入是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维度的全方位融入,不具有递进性[17],因为社会融入在实践中非常复杂,各维度的进展并非平行,也不具有先后次序[18]。

然而,不管是融合论、同化论、多元文化论还是递进学说抑或多维学说,其分歧主要在于对融入过程中影响因素、影响次序等持有不同见解,但对最终融入的结果并没有异议,均认为客体的社会融入随着时间推移将必然发生,融入路径中不会出现异化情况,最终结果也是皆大欢喜的高度融合。那么,这种“社会融入必然论”显然无法对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存在的、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贫民窟、移民社区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四处可见的城中村进行合理解释和有效回应。

(三)失地农民社会融入路径异化与内卷化的理论框架

尽管国内学者们从社会文化、制度供给、社区环境等不同视角分析了融入中可能面临的困难并提出了相应对策,但研究结论明显受到了“社会融入必然论”的深刻影响,大多学者认为,随时间推移,失地农民将逐渐接受城镇新规范并融入新社会体系。也就是说,只要边界开放和没有预设障碍,失地农民整体上能在打破制度壁垒与阶层壁垒、重塑城镇社会结构的过程中顺利完成“再社会化”,沿着“迁移—适应—融入”这样一个线性轨迹发展。然而,失地农民社会融入既牵涉阶层又关乎个体,既有传统性解构也有现代性重构,并非一个单纯的市民化问题。况且,社会融入毕竟受失地农民禀赋特征、认知能力、心理活动、生活经历与社会记忆等诸多个体因素影响,纵使在外部环境同质的条件下,因为个体异质性的客观存在,起点相同的失地农民,融入过程与最终结果也不一定完全一致。国内学者有关农民工和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路径异化和内卷化现象的研究及其结论[19-20],实际上已经对此提供了警示。

既然具有一定主动市民化动机的农民工或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出现了路径异化,产生了内卷化现象,作为被城镇化的特殊群体,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更有可能会出现路径异化和内卷化。在土地被征收前,地方政府通常会告知失地农民相关信息,大家会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此时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心理适应期。失地农民整体搬迁到集中安置的居住场域,生存空间转移和身份转换同时实现,但失地农民因各方面的原因,会经历一个短暂的融入调适期。心理适应期和调适期实际上就是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第一个阶段,可谓之融入缓冲期。缓冲期后,在适者生存和对幸福生活追求的双重驱动下,失地农民竞相适应新生活环境和新社会规范,社会融入状况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大批失地农民开始适应新的生活和环境,“融入”相对“未融入”的优势较为明显,这个阶段可视为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第二个阶段,即快速融入期。接下来,部分年龄稍

大、文化程度较低等适应能力较差的失地农民,在社会各界帮助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干中学”,也相继融入社会,但此时融入者的相对数量开始减少,“融入”相对“未融入”不再具有明显优势,两者开始接近,继而相对僵持并最终出现优势逆转,这标志着失地农民社会融入整体上已经步入第三个阶段,即社会融入转折阶段。相对融入缓冲期和快速融入期建立起来的融入趋势而言,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已经开始偏离理想轨道,也就是出现了路径异化。再接下来,还有较大部分文化程度较低和技术贫乏的失地农民始终无法摆脱就业困境,也可能有部分失地农民非理性消费后开始返贫,这些失地农民的心理开始出现消极变化,在负面情绪疏导机制缺失的条件下,社会融入愈发艰难,日常交往对象被锁定为原有社会网络。此时,尽管仍有极少数失地农民在努力抗争、竭力习得城镇规范并缓慢融入,但“未融入”相对“融入”已经占据绝对优势且这种优势已经被固化、难以撼动,这意味着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已经面临“天花板”效应,也就是说,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将进入第四个阶段,即内卷化时期(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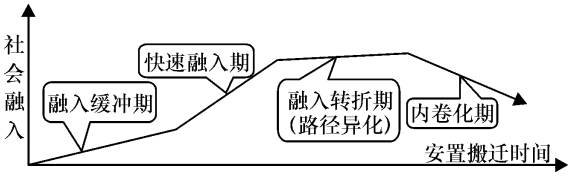


图1 失地农民社会融入阶段的理论推演图

图1清楚地表明,从整体上看,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并没有遵循经典理论和学者们预设的“迁移—适应—融入”线性轨道完美演绎,而是沿着“缓冲适应—快速融入—融入转折(路径异化)—融入内卷化”的轨迹运行。

三、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实证检验

根据上述理论推演,本研究对广东、湖南、广西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城镇化率地区的失地农民社会融入情况进行实地调查,以实证检验其社会融入阶段的演变情况。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500份,回收问卷2439份,有效问卷为2368份,问卷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97.56%和94.72%。调查涉及上述三省(自治区)30个乡(镇)、72个社区(村),调查对象为年满18周岁的失地农民,主要为户主。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社会融入是本研究的因变量。本研究以失地农民日常主要交往对象为其社会融入的鉴别与诊断标准,以避免主观评价欠缺严谨性。如失地农民日常主要交往对象是搬迁前的亲戚、朋友、邻居等群体,那就说明其社会融入并没有真正实现。相反,如果是新邻居、新朋友或者是现同事、城镇其他人等群体则说明其社会融入已经在一定程度得以实现。为此,在因变量社会融入选项中设置了“原亲戚”“原邻居/原朋友”“新邻居/新朋友”和“现同事/城镇其他人”四个选项,然后根据调查结果将前两项统一归为“未融入”(取值为0),将后两项归为“已融入”(取值为1),作二分类处理。

2.解释变量

因本研究重在探讨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路径异化与内卷化问题,因此首先假定外部政治、经济、文化、社区等因素对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具有同一性,不将这类因素选入解释变量体系。时间是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状况的计量标准,个体及家庭禀赋是社会融入中最具能动性的因素,因

而解释变量主要从这两个维度选取。时间维度只选取安置搬迁时间一个核心变量，个体及家庭因素中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目前就业情况、目前收入情况共六个变量。本研究各变量的解释及其赋值如表 1。

表 1　变量解释及赋值

变量	变量解释与赋值
被解释变量	
社会融入(Y)	未融入 =0；已融入 =1
解释变量	
个体及家庭因素	
性别(X_1)	男性 =1；女性 =2
年龄(X_2)	30 岁以下 =1；31 ~40 岁 =2；41 ~50 岁 =3；51 岁以上 =4
婚姻状况(X_3)	未婚 =1；已婚 =2
文化程度(X_4)	小学及文盲 =1；初中 =2；高中/中专 =3；大专及以上 =4
目前就业状况(X_5)	失业 =1；临时工 =2；稳定工作 =3
目前收入状况(X_6)	比失地前下降 =1；和失地前一样 =2；比失地前增加 =3
时间因素	
安置搬迁时间(X_7)	1 年及以下 =1；1 ~2 年 =2；2 ~3 年 =3；3 ~4 年 =4；4 ~5 年 =5；5 ~6 年 =6；6 ~7 年 =7；7 年及以上 =8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因本研究重在探究不同安置搬迁时间下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状况，因而只将社会融入时间落在“同一安置搬迁时间”内的新融入的样本记为已融入，剔除在本时间段以前已经融入的样本。如某样本“安置搬迁时间”为“3 ~4 年”，但已经在“1 ~2 年”时段内融入了社会，则该已融入样本不计入“3 ~4 年”时段。因此，实际使用样本数据只有 1935 个。1935 个样本数据的基本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调查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说明	频数	百分比	变量	说明	频数	百分比
Y	未融入	1023	52.9	X_5	失业	456	23.6
	已融入	912	47.1		临时工	559	28.9
X_1	男	981	50.7		稳定工作	920	47.5
	女	954	49.3	X_6	比失地前下降	543	28.1
X_2	30 岁以下	114	5.9		和失地前一样	612	31.6
	31 ~40 岁	423	21.9		比失地前增加	780	40.3
	41 ~50 岁	672	34.7	X_7	1 年及以内	203	10.5
	51 岁及以上	726	37.5		1 ~2 年	269	13.9
X_3	已婚	1774	91.7		2 ~3 年	307	15.9
	未婚	161	8.3		3 ~4 年	270	14.0
X_4	小学及文盲	817	42.2		4 ~5 年	221	11.4
	初中	583	30.1		5 ~6 年	238	12.3
	高中/中专	398	20.6		6 ~7 年	209	10.8
	大专及以上	137	7.1		7 年及以上	218	11.3

按照本研究定义的“未融入”与“已融入”，前者占比为 52.9%，略高于后者的 47.1%，失地农民整

体的社会融入情况并不理想,但该结果略好于陈浩等、王美琴实地调查的46.71%和48.52%的融入比[21-22]。样本的性别分布基本均衡。年龄主要集中于"41~50岁"和"51岁及以上",两者合计超过70%。因本研究将丧偶、离异归于已婚且调查对象主要为户主,因而已婚样本占比高达91.7%。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及文盲"和"初中",占比分别为42.2%和30.1%。获得稳定工作的失地农民略多于失业和临时工作者,占比为47.5%。目前收入状况中"比失地前增加"的样本为40.3%,整体情况并不理想。安置搬迁时间中的样本分布大体上是均衡的(表2)。

(三)计量分析结果解读

要通过安置搬迁时间这一个核心变量洞察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路径异化与内卷化问题,首先需要确定该变量是否对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然后确定影响的稳定性。因此,本研究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即先探究安置搬迁时间对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影响,然后将失地农民个人及家庭因素引入计量模型,作进一步考察。运行SPSS19.0软件进行估算,以每个变量的最后一个值作为参照组,进入与删除标准分别设置为0.05和0.1,得到Logistic回归结果(表3)。

表3 Logistic回归结果 **单位:亿元**

维度	解释变量	模型Ⅰ			模型Ⅱ		
		B	Sig.	Exp(B)	B	Sig.	Exp(B)
个人及家庭因素	$X_1(1)$	/	/	/	-0.020	0.876	0.980
	$X_2(1)$	/	/	/	1.873	0.000	6.507
	$X_2(2)$	/	/	/	1.707	0.000	5.512
	$X_2(3)$	/	/	/	0.412	0.005	1.510
	$X_3(1)$	/	/	/	-0.095	0.681	0.909
	$X_4(1)$	/	/	/	-1.365	0.000	0.255
	$X_4(2)$	/	/	/	-0.606	0.045	0.545
	$X_4(3)$	/	/	/	-0.522	0.097	0.594
	$X_5(1)$	/	/	/	-3.317	0.000	0.036
	$X_5(2)$	/	/	/	-2.457	0.000	0.086
	$X_6(1)$	/	/	/	-0.073	0.644	0.929
	$X_6(2)$	/	/	/	0.214	0.164	1.239
时间因素	$X_7(1)$	1.472	0.000	4.359	1.117	0.000	3.056
	$X_7(2)$	2.190	0.000	8.938	1.283	0.000	3.609
	$X_7(3)$	2.259	0.000	9.571	1.661	0.000	5.262
	$X_7(4)$	1.923	0.000	6.844	1.330	0.000	3.780
	$X_7(5)$	1.860	0.000	6.421	1.792	0.000	6.002
	$X_7(6)$	1.524	0.000	4.589	1.581	0.000	4.862
	$X_7(7)$	1.117	0.000	3.055	0.674	0.030	1.963
参数	常量	-1.760	0.000	0.172	0.356	0.435	1.428
	模型总卡方		175.021			1102.749	
	Sig.		0.000			0.000	
	-2对数似然值		2501.087[a]			1573.360[a]	
	Nagelkerke R方		0.086			0.434	
	Cox & SnellR方		0.115			0.580	

注: ***、**和*分别表示统计检验达到0.01、0.05和0.1的显著性水平(双尾)

从表3可知,随着失地农民个人及家庭因素引入计量模型,模型总卡方值明显增大,决定系数

R^2 也同步增大，而 -2 对数似然值则同步变小，这表明模型Ⅱ比模型Ⅰ具有更高的拟合优度和更强的解释力。

模型Ⅰ中，以“7 年及以上”为参照，安置搬迁时间因素中“1 年及以下”到“6～7 年”均通过了 0.01 的置信水平检验，系数均为正，Exp（B）值分别为 4.359、8.938、9.571、6.844、6.421、4.589、3.055，均大于 1，具有先放大、再缩小的特征。该特征实际上表明，相对安置搬迁时间为“7 年及以上”的样本而言，“1 年及以下”到“6～7 年”的样本更容易融入社会，但融入的优势具有先逐渐变大再逐渐变小的演变特征。

模型Ⅱ中，性别、婚姻和目前收入状况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年龄、文化程度、目前就业状况、安置搬迁时间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在年龄变量中，相对“51 岁及以上”的样本，“30 岁以下”“31～40 岁”“41～50 岁”样本的优势比分别为 6.507、5.512 和 1.510，且系数均为正；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年龄越小的失地农民越容易实现社会融入；其可能的解释是失地农民越年轻，学习能力越强，恋土情结越不严重，社会融入的阻碍也就越小。在文化程度变量中，相对“大专及以上”的样本，“小学及文盲”“初中”“高中/中专”样本的优势比分别为 0.255、0.545 和 0.594，且系数均为负；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这些样本相对“大专及以上”样本而言，实现社会融入的可能性依次减少 74.5%、45.5% 和 40.6%；其原因可能是文化程度越高的失地农民，往往具有更强的自信心和就业能力、也具有更强的社会交往能力，因而也就越容易实现社会融入。在目前就业状况变量中，相对“稳定工作”的样本，“失业”和“临时工作”样本的优势比分别为 0.036 和 0.086，且系数均为负；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失业”和“临时工作”样本相对“稳定工作”样本实现社会融入的可能性依次减少 96.4% 和 91.4%；其原因是稳定就业的失地农民长期与同事接触，稳定且广泛的业缘网络无疑有助于其社会融入。安置搬迁时间变量中，Exp（B）值同样具有与模型Ⅰ一致的特征。为此，本研究利用 SPSS 软件将安置搬迁时间与同期的样本分布（即失地农民社会融入）进行交叉制表，以便从数据变化趋势来洞察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变化规律（表 4）。

表 4　社会融入 * 安置搬迁时间交叉制表

安置搬迁时间	1 年及以内	1～2 年	2～3 年	3～4 年	4～5 年	5～6 年	6～7 年	7 年及以上
未融入	57.14%	39.41%	37.79%	45.93%	47.51%	55.88%	65.55%	85.32%
已融入	42.86%	60.59%	62.21%	54.07%	52.49%	44.12%	34.45%	14.68%

从表 4 可知，不同安置搬迁时段内未融入和已融入的占比具有较为明显的变化规律，未融入呈现出先缩小、再放大，而已融入呈现出先放大、再缩小的趋势特征。为直观反映这一演变规律，本研究以安置搬迁时间为横轴、以“已融入”和“未融入”在各时段的占比为纵轴绘制了失地农民社会融入曲线图（图 2）。图 2 显示，“已融入”和“未融入”曲线阶段特征明显，“已融入”曲线先快速上升，然后经历了一个较为短暂的平稳期，接着开始缓慢下滑，最后变为快速下滑，“未融入”曲线则与之相反。如果将安置搬迁之前政府宣传下失地农民心理准备时间视为融入缓冲期，那么“已融入”曲线上升趋势非常明显的阶段就对应着前文的快速融入期，短暂平稳期和缓慢下滑期对应融入转折期，也就是路径异化时期，“已融入”和“未融入”曲线相交之后的时期则可视为融入内卷化时期。可见，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逻辑推演具有一致性，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路径异化与内卷化现象客观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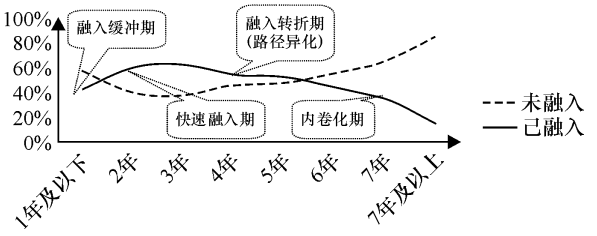


图2 失地农民社会融入曲线图

四、应对失地农民社会融入路径异化及内卷化的思路

(一)加强搬迁前的思想教育

失地农民的搬迁具有被动性,被动搬迁下难免会有抵触情绪,抵触情绪无疑会影响未来的社会融入。思想教育是消除抵触情绪、转变认知最有效的方式。地方政府要综合运用群众公开信、宣传专栏、移动标语、现场咨询等方式方法,加大城镇化建设及土地征收等政策法规的教育与宣传,让政策法规人人知晓、户户支持,帮助失地农民增强全局意识,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关系,使被动搬迁变主动搬迁,进而消除可能产生的抵触情绪,奠定社会融入基础。地方政府还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接地气"的特殊作用,提前做好社会融入的思想动员与教育工作,除会上有社会融入的动员、墙上有城镇新生活的宣传之外,还要通过干部包村、党员入户的方式,进行地毯式、拉网式的社会融入知识传授,使失地农民转变认知,做好迎接新生活的思想准备,缩短适应期,加快社会融入。

(二)强化搬迁后的技能培训与就业支持

本研究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就业越稳定,失地农民越容易实现社会融入。然而,对失地农民而言,因生计、年龄等原因,要系统地提高其文化程度已经不现实,但可以通过补偿性教育对此进行弥补。因此,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失地农民搬迁后的技能培训,在以社区为平台建立就业信息档案的基础上,健全培训实施、评价、考核机制并尽量采用诸如订单、委托等与就业直接挂钩的培训方式。有研究指出,劳动密集型轻纺业在吸纳劳动力数量上是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2.5倍,而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则更是高出资本、技术密集型大企业10倍以上[23]。因此,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实践中应适度发展技术准入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就业容量,增加失地农民就业机会。同时,工业园区、开发商等用人单位也应增强社会责任感,为失地农民提供适用培训并为其开创适合的就业岗位。

(三)注重融入过程中的心理疏导

由于长期以来城市和乡村在生活习惯、人际交往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失地农民社会融入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心理障碍,而化解心理障碍的有效手段就是心理疏导。首先,要强化失地农民一夜暴富扭曲心态的疏导。部分失地农民获得补偿款后攀比购买汽车、追求奢侈品,很快返贫,继而陷入社会交往对象封闭化和社会融入内卷化陷阱。因此,应帮助其建立健康的财富心理和消费观念,让其学会算经济账、效益账和长远账,理性规划未来,合理使用补偿款。其次,在失地农民社会融入面临困境时,要加强负面情绪的心理疏导。失地农民的负面情绪如不能及时消除,会导致其不断强化自身悲观处境以及否定改善的可能,并通过"怨恨式批评"等方式影响整个群体社会融入进程。此时,基层工作者要通过亲情回访等活动,认真听取失地农民的情感倾诉,让其适当宣泄情绪,然后对其进行邻里关系、自我保护与救助等方面的心理辅导,让其及时调整心态,走出"体

验式伤害”产生的心理阴影。

（四）建立社会融入的社区支持系统

同时具有“居住地效应”和“同群效应”的安置社区，是失地农民情感交流、心理认同以及缓解隔离并拓展接触边界的港湾[24]。因而，安置社区理应成为失地农民社会融入长期且有力的支持平台，在各个时期、面对禀赋不同的失地农民都应发挥“全天候”式的、兜底式的支撑功能。首先，地方政府在规划安置社区时，要注重广场、体育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提供公共活动空间[25]。其次，社区居委会可通过社区宣传栏、宣传小册等途径向失地农民动态传递就业、创业等成功典范，通过正能量传递以及乐观情绪感召，培养失地农民积极上进心态。再次，社区居委会可定期组织秧歌、腰鼓、棋牌等大众化文娱活动，增进失地农民内部的情感交流，拓宽人际关系网络，从而增强其对新生活和新环境的认同。最后，社区居委会可在当地共青团组织的指导下成立以中青年为主要组成成员的社会融入互助组织，利用年轻失地农民更容易实现社会融入的优势，通过“以青带老”互助方法，帮助年老失地农民顺利融入社会。

参考文献：

[1]梅伟娟. 淮安市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研究——基于淮阴工业园区的调查[D]. 重庆：西南大学，2011.

[2]吴秀娟，张训，保韩玮，等. 城市化进程中苏北地区失地农民心理健康状况与影响因素研究[J]. 现代预防医学，2009(9)：1692－1694.

[3]张建国. 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研究[D]. 武汉：武汉大学，2011.

[4]张宇.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教育补偿研究[D]. 天津：天津大学，2015.

[5]赵琴. 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对城郊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影响——基于贵州省凤冈县的调研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2015(9)：71－78，111－112.

[6]胡鹏辉. 社会底层：结构机会与心态危机——以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为例[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1)：139－145.

[7]王娟. 促进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实践路径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2017(4)：66－71.

[8]徐至寒，金太军，徐枫.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路径的障碍及其消解——基于资本要素禀赋的视角[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1)：57－66.

[9]LENOIR R. Les exclus：un francais sur dix[M]. Pairs：Seuil，1974.

[10]陈成文，孙嘉悦. 社会融入：一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6)：66－71.

[11]S CASTLES. The factors that make and unmake migration policies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2004，38 (3)：852－884.

[12]徐晓军，邵占鹏. 失衡：主体预设对客体解释类型的依附——“社会融入研究”的路径分析[J]. 学习与实践，2012(4)：95－101.

[13]R ALBA，V NEE. Rethinking assimilation theory for a new era of immigration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review，1997，31 (4) ：137－160.

[14]A PORTES，RN PARKER，JA COBAS. Assimilation or consciousness：perceptions of U. S. society among recent Latin American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J]. Social Forces，1980，59 (1) ：200－224.

[15]朱冬亮，高杨. 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及对策分析[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4)：73－79.

[16]WR BÖHNING.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M].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84.

[17]陈晶. 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几点争论——在“时间—空间—群体”维度上的探讨[J]. 人口与社会，2017(3)：23－32.

[18]杨菊华.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 人口研究，2009(1)：17－29.

[19]王东红，李开宇，郝凤娇. 农民(工)城市融入“内卷化”测度与空间分异研究——基于社会生活空间视角[J].

西北人口,2014(6):64-70.
[20]潘泽泉,林婷婷.劳动时间、社会交往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研究——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5(3):108-115,128.
[21]陈浩,葛亚赛.基于可行能力的失地农民市民化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7-25,142-143.
[22]王美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实困境与应对机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31-137.
[23]赵丁琪."民工荒"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6):66-72.
[24]曾润喜,朱利平,夏梓怡.社区支持感对城市社区感知融入的影响——基于户籍身份的调节效应检验[J].中国行政管理,2016(12):43-49.
[25]叶继红.集中居住区移民社会网络的变迁与重构[J].社会科学,2012(11):67-75.

Path Alienation and Involution of Land-lost Farmers in Social Integration

JIANG Wei-guo[a], LI Li-qing[b]
(*a.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b.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 social integration of land-lost farmers do not follow the linear "move-adapt-integrate" track proposed by classical theory or preconception, but presents path alienation and involution. Empirical test was made 1935 sample data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sample, whose resettle time is "1 years and less" to "6-7 years", is easier to integrate into society, comparing to "7 years and more" samples, but the integration priority evolves from gradually getting enlarged to lessened. This shows that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land-lost farmers takes the track of "buffer adaptation-quick integration-integration halt (path alienation)-integration involution" on the whole. Therefor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before the relocation, provide he skill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support after the relocation, and emphasize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during the integration and establish the community support system.

Key Words: land-lost peasants; social integration; path alienation; involution